

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背后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作出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在今年的烈士纪念日,让我们讲述一个关于“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故事,以纪念和告慰那些英勇牺牲、长眠地下的革命先烈。

在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新中国第一张烈属证,也就是第00001号烈属证颁发给谁了呢?有关媒体披露了这张烈属证背后令人动容、催人泪下的秘密。

女儿揭示父亲不寻常的历史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的就是辽宁凤城人从德滋烈士的家属,现在,这张证书保存在他的女儿从丹在甘肃兰州的家中。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亲笔在这个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毕业于东北大学的从德滋曾经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在1942年壮烈牺牲。在见到烈士的女儿从丹后,邓小平叮嘱她“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

当有关媒体记者采访时,从丹说,希望有一天这张烈属证能够回到她父亲的家乡,让家乡人了解她父亲的那段不寻常历史。

曾蹲大狱,也做过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1910年10月,从德滋出生在辽宁省凤城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他在凤城第二师范求学时开始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3年,从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以后,被介绍到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北平分会政

训处工作。1934年,为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德滋开始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和内战行径,不久就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人的罪名逮捕,羁押于武汉行营,这是他第一次入狱。

直到这年9月,在张学良将军亲自过问下,从德滋才被释放,出狱后他就被安排在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出任总编,最早刊发“西安事变”始末

随着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从德滋也随军到了西安。他在西安创办了《西北向报》刊物,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力量。“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国民党陕西《西京日报》更名为西安《解放日报》,从德滋出任总编辑,而正是《解放日报》最早刊发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经过和张、杨“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办公厅,从德滋负责特种宣传组工作。

在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囚禁后,根据斗争需要,从德滋被党组织秘密转移到西北,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同志介绍到兰州,由谢觉哉同志直接领导,在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并创办了《民众通讯社》,亲任社长。

再次被国民党秘密逮捕,被毒害狱中

1938年秋,经谢觉哉和伍修权同志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从德滋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他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在谢觉哉同志的安排下,从德滋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任政治部

主任曾扩清的秘书。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曾扩清找从德滋谈话,态度十分反常,从德滋预感到敌人已经怀疑他是中共秘密党员。1941年1月20日,敌人将从德滋秘密逮捕,关押在兰州郊外大沙沟秘密监狱的一口井中。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后来把他关在站着伸不直腰、躺着伸不开腿的小铁笼子里。在他入狱后,党组织多方营救,但均未获成功。张学良的老师莫德惠也曾派人前往重庆向蒋介石说情,也被蒋介石拒绝。

1942年4月19日,从德滋发高烧,要求喝碗水。敌人看他病得太严重,就给了他一碗下了毒药的污水,从德滋中毒身亡,敌人将他的遗体扔在了白塔山下一个破窑洞里。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和他的生前好友冒着敌特监视的危险将他的遗体装殓后,葬在兰州郊区五省义园墓区。解放后,党和政府将其遗骨移至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

毛泽东亲笔签署“第00001号烈属证”

从德滋牺牲时,从丹才三岁,但是到1951年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从德滋。据从丹介绍,解放后,中央军委联络处多方打听从德滋烈士一家的下落。尤其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更是不忘从德滋这位早逝的革命战友留下的孤儿寡母。1950年冬天,中央开始落实烈士遗属的政治待遇时,谢觉哉想到了与自己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从德滋,并将有关情况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在“西安事变”时,他就知道从德滋。不久,毛泽东亲笔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00001号烈属证”。

摘自《读友报》

张铁生从“白卷英雄”到亿万富豪

近日,监会官方网站发布10家企业招股说明书,禾丰牧业位居其中。而在禾丰牧业400多页的招股说明书中,特别显眼的是公司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张铁生。因“白卷英雄”一称而家喻户晓的张铁生在入狱15年后,下海经商,成为禾丰牧业原始股东。据该公司招股说明书称,张铁生持有3224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6.8%。公司若顺利上市,张铁生身家估计将超过3亿元。

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据记载,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张铁生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他却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这一封

信让张铁生得到重视,最终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并被冠之以“白卷英雄”一称。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释放。1993年2月,张铁生和金卫东等4人合伙出资20万元成立沈阳市天地饲料厂。1998年初,天地饲料厂被并入金卫东旗下的沈阳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禾丰牧业净资产近13.6亿元。张铁生6.8%的持股比例对应净资产达9000万元。2011年,禾丰牧业每股收益为0.57元,按主板平均20倍的发行市盈率预测,禾丰牧业的发行价在10元左右,张铁生所持股票将为他带来3.2亿元市值的财富。

摘自《现代快报》

一场意外选美导致西汉灭亡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两帝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史家对元帝的评定是“柔仁好儒”。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淮阳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没有废立太子。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如此“柔仁好儒”之人,为何自他起,西汉会渐趋衰落呢?

纯任德教影响到西汉政权的效能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婪,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

加以实施的。

从此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一次选美改变西汉历史

公元前54年,太子刘爽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太子因而悲愤成疾,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宣帝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5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爽自择中意之人。这时的刘爽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个人还可以吧。”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把这位幸运儿送入太子宫。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次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皇室有了继承人,便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骥。

公元前50年,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爽即位,史称汉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平阳侯,又立王政君为皇后。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为长乐卫尉的重任,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刘爽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从此,王氏外戚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为日后的王政君侄儿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

虽然元帝“柔仁好儒”,终因用人不当,威权旁落,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衰落。

摘自《百家讲坛》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执政32年屠杀50万华人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据古籍文献的记载,早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华人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出售从中国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收购当地出产的香料、药材等土特产,并将中国先进的种植、酿酒、制糖、制绢、冶炼等生产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了印尼,为当地的繁荣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据统计,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约有三分之二属于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其中有43%以上的华人家庭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三代以上。

苏哈托浑水摸鱼窃取国家最高权力

1965年9月30日,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〇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

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以华人的鲜血为道具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恨。报仇恨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没人说得确切的数字。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惨无人道的“五月暴行”

32年后的1998年5月,就在苏哈托政权行将就木的前夕,苏哈托故伎重演。当时,一些印尼大学生

举行游行,号召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开枪射杀6名大学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暴乱。眼看局势即将失控,苏哈托再次制造种族议题,宣扬“华人在偷盗印尼的财富”,指使亲信率先掀起血腥的“排华”暴行,以转移国内矛盾。一场反对苏哈托的政治运动,随即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排华“五月暴行”。

当时,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华人奈达,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说:“雅加达的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华人妇女全都遭到强奸。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就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

苏哈托执政32年,逾50万华人遭屠杀——这是铁的事实。倒在苏哈托屠刀下的华人,几乎都是已经加入印尼国籍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人移民,因此,是否追究苏哈托的屠杀罪行,已属于印尼内政,取决于印尼民众自己的意愿。然而在历史的记忆里,这一抹血色终难就此消逝。

摘自《环球人物》